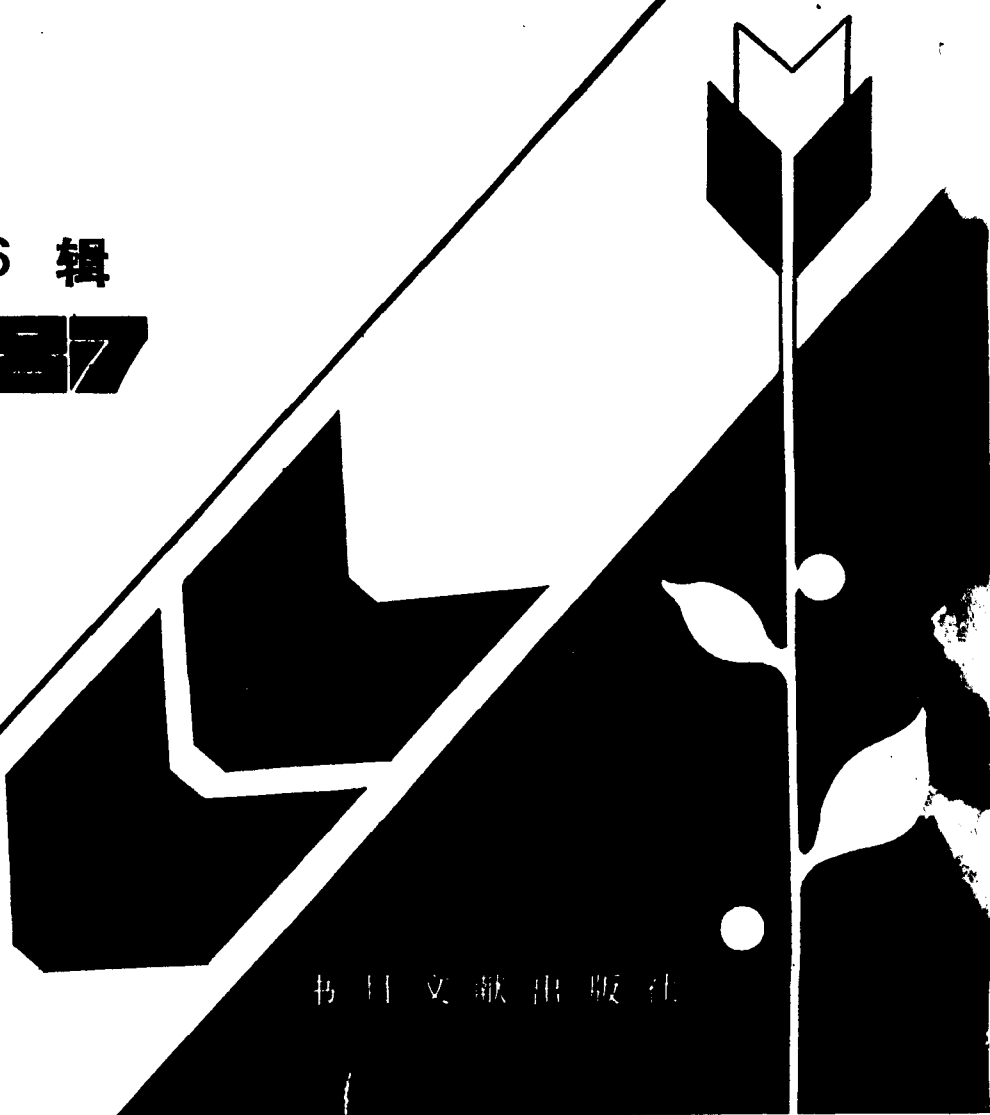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化研究

第 6 辑

1987

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由于我国“四化”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,广大科学研究人员,文化、教育工作者以及党、政有关领导机关,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研究动态。为此,本中心编辑《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》,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。

本专辑所收的资料,系按专题选编,照原报刊版面影印。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,一般不作改动(如有改动,当予注明),仅于每期编有目次,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,以资查阅;必要时附“编后记”,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。

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。对于反对我四项基本原则,对我国内情况进行捏造、歪曲或对我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,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,概不收录。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,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、观点、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,甚至对立,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,对此,我们不急于置评,相信读者会予注意,能够鉴别。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“我国”、“中华民国”、“中央”之类的文字,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、国民党中央而言,不再一一注明,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。

为了统一装订规格,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,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,即封面倒装。

本专辑的编印,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,限于内部发行。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保管,慎勿丢失。

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

文化研究 (6)

——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(1987)

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编辑

季啸风 李文博主编

建章 选编

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文津街七号)

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787×1092毫米 1/16开本 4 印张 102 千字

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,000册

ISBN 7—5013—0124—7/G·6

(书号 7201·169) 定价 1.15元

[内部发行]

目 次

以中国人的观点看天下	李金铨	一
从传统文化看未来的挑战	李钦湧	四
中西文化的分野	周瑞玉	一一
秦文化初探	涂艳秋	一三
自群经之礼乐思想观殷周人文理念之升沉	江宝钗	二二
对古迹之回顾与前瞻	吴绍华	二八
陶渊明历史地位及其诗中之文化要义	苏文擢	三五
文化是一个许诺	杭 之	三九
连续与破裂：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	张允直	1
从世界思潮的几个侧面看儒学研究的新动向	杜维明	9

美國密西根大學大眾傳播學博士

李金銓： 以中國人的觀點看天下

我們要以自己的社會、文化、民族的利益為出發點，保持非常開放的態度，瞭然外界的環境，然後做出冷靜的選擇與理性的判斷。

問：在全球國際體系下，臺灣角色的「定位」一直是個備受爭議的課題，有的學者認為臺灣已邁向「已開發國家」之林；有的學者則認為臺灣還只是依賴體系下的一個邊陲國家，以您常年旅居海外的經驗，對這個問題有何看法？

從二方面來討論

答：臺灣缺乏天然資源，土地狹隘，人口稠密，而且所面臨的生存環境非常艱險，能有這種成就，確實是相當不易。但基本上，臺灣仍然是在整個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下的「依賴性

發展」(dependent development)，也就是既依賴、又發展，依附在國際資本主義體系求生存與發展。這是事實，並沒有貶意。至於所謂「開發中國家」和「已開發國家」的標準，除了經濟，還得顧及經濟以外的指標。我們不妨從經濟、政治和文化三



高洪波 攝

方面來討論：

一、當然，臺灣在經濟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，而且也是第三世界的楷模。但是，不可否認的，臺灣正如尹仲容先生所說的，是個「沒盤」經濟，必須大量依賴外資與外貿。以外銷來說，目前有百分之五十的市場集中在美國，所以在最近與美國的談判當中，美國給臺灣帶來的壓力是能強烈感受到。此外，自前似也面臨了工業升級的陣痛。全世界「鬧窮」，只有我們「鬧富」，游資過剩沒處去，這是反常的現象。

二、我們所說的政治發展，當然是指民主自由法治的發展。我覺得，黨外的制衡象徵民間力量的成長，是有益於臺灣本身體系的健康的，雖然黨外人士有許多作風是惹氣用事，內部也缺乏民主風度。這民主風度正是朝野雙方皆須努力發展的。總之，臺灣三十幾年來的確是在穩步前進，大方向正確，步履却非常蹣跚。政治的發展是否到達「已開發國家」的境界？這得要看我們民主自由法治的步伐到了什麼地步。從這個意義來說，最近蔣經國先生對取消戒嚴法作的一些談話，是深具遠見的。

三、再就文化層面來看，臺灣的經濟奇蹟，三十年前人們做夢也想不到。由於一時暴發，整個社會價值也受到市場的扭曲，一切向「錢」看，所以我們的文化表現就顯得很沒有格調。也因此有人說，臺灣是個暴發戶的文化。

我們從藝術活動和文化生活兩方面來看臺北。一方面，文化藝術活動，（如音樂會、圖書館、美術館或劇場等），非常缺乏，所以像林懷民這批人特立獨行，開風氣之先，真是了不起。另一方面，文化就是生活本身。如在臺北，一談到文化似乎就必須到故宮去，古人遺留的智慧誠然是全人類文明的瑰寶，可是我們一走出博物館，古和今是割斷的，傳統與現代並未結合成為一個活生生的機體。

我覺得，我們對自己的定位應該要有較真切的瞭解，既不要妄自尊大，可也不能太高估自己。必須瞭解我們已有那些成就，有那些缺點必須改進，這樣才是不亢不卑的心理。

以中國人的觀點看天下

問：國際實況秩序受到挑戰，是與整個國際政經結構的不變互為因果的；在此不變之際，我國應如何在實況的「民族性」與「世界性」的緊張關係之間，允執厥中？

答：今天我們要在「民族性」與「世界性」之中作一明智的抉擇，消息就必須要靈通，才能够「知己知彼」，權衡事情的輕重。一方面透過「知彼」來為自己定位及尋求出路；另一方面透過「知己」，才能以心平氣和的態度觀察整個國際外在環境。

今天臺北的有識之士提倡要以「中國人的觀點看天下」，很對。但首先我們要瞭解什麼是「中國人的觀點」？中國人所要觀察的是什麼？我認

為，「中國人的觀點」是以自己的社會、文化、民族、文化的利益為出發點，永遠保持一個非常開放的態度，了然於外界環境，然後做出冷靜的選擇與理性的判斷。同時，我覺得，應永遠站在「人民、文化和民族」的立場上；這個優先順序尤其不可馬虎。例如中共現在扛着「民族主義」的大旗向臺灣作挑戰，但我們覺得民族統合不能犧牲人民的利益，或砍斷文化的精神，所以應該反統戰。

塑造適當的國際形象

問：以傳播的觀點而言，您認為中華民國應以何種具體的文宣策略，塑造她適當的形象？

答：國際宣傳不能墨守成規，必須求新求變才有出路。我們就從五方面來說：

第一，如果對外界環境太隔閡，自願做井底蛙，關着門作文宣工作，那是沒有效果的，甚至有反效果的。還是「知己知彼」那句話，才能將文宣工作做好。

第二，宣傳工作的得失不必看得太重，認為宣傳必須收到立即的效果，天下沒有那回事。如果一個人對臺灣原本有八分成見，在接觸客觀事實後，只剩六分成見，這已經是相當了不起了，豈能再求多？所以說，文宣工作不必急功近利，要爭千秋，不是爭朝夕。

第三，中國人常喜歡求全。臺灣確實有很多優點和進步，但仍有不少

缺點，千萬不能夠驕疾忌憚。宣傳工作要讓別人瞭解臺灣是快速在「進步的」，而不是要人家覺得臺灣是「完美的」。世界上沒有完美的社會。

第四，文宣工作一定要公正、客觀，不能入股。為什麼官方宣傳沒有效？因為大家懷疑它可能會斷章取義，作手脚，對它沒有信心，甚至起反感。其實，最好的宣傳就是事實本身。宣傳技巧上，可以更加活潑、開放，多嘗試，不按牌理出牌。以臺灣目前的成就而言，也有本錢犯幾次小錯誤，不必太計較。

最後，要講求效果。用人的不當、與社會脫節……，這都是使宣傳效果大打折扣的因素。錢花了，工作做了，務必考核追蹤，而不能向上級報差了事。

資訊的自由化與國際化

問：最近，我國朝野俱在呼籲貿易應朝向「自由化」與「國際化」的原則，請問「自由化」與「國際化」的原則，在目前國內的政治情境下，能否適用於資訊的傳播上？它們的真諦何在？

答：資訊與一般經濟產品有異有同。同的是它們都必須在市場上立足，才能生存發展。但另一方面，資訊又不同於電冰箱、電視機、摩托車等商品，因為資訊的作用在長期建構一個世界觀。我們對世界的瞭解必須透過資訊，資訊並不像一般商品那樣單純交易，而沒有太多後遺症。資訊所

產生的文化影響是潛移默化的，長期的，牢固的，而且不自覺的。

我贊成「自由化」，因為人為限制愈少愈好，讓資訊暢其流。我們的眼光不可老是只看著美國，或只聽美國某一特定傾向或特定階層的聲音。美國和我們關係固然密切，但是我們更要瞭解歐洲、日本或第三世界的各種觀點，而且最好帶著一種批判、綜合的立場去瞭解，如此選擇的途徑才會廣，眼界才會高。資訊如不暢通，整個政策的擬定則像打濶仗，必缺乏深度和廣度。

再者，我不知道社會上對「國際化」怎麼界定。我們處在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半邊陲地位，是不得已的，千萬不必沾沾自喜。如果我們的世界觀完全透過美國或少數國際強權的媒介來建立，那是非常可怕的。換句話說，我們可以參考他們的觀點，但不可以喪失我們自己的立場。追根究底，最後就是應該如何在「世界性」和「民族性」找到平衡點了。如果「國際化」是指有國際性的眼界，我贊成；如果是指放棄自己的立場，那麼我反對。

時時反省自己的優缺點

問：以資訊傳播的國際標準而言，請問您如何為臺北定位？

答：總之，我們的困境是：一方面美國通俗文化在國內泛濫（這本身也沒有關係，如果有其他高雅文化搭配的話），另一方面我們又不瞭解別人

文化的精髓，也不曉得人家怎麼想。

「中國人的觀點」其實沒有絕對的定義，它必須與時俱進，因時因地制宜，反省自己的優缺點，針對我們長程和近程的目標，決定付出何種代價以達到這些目標。

研究海外華人社區

問：您這次應邀回國參與「海外華人社區」的研究計劃，請您談談這項研究計劃的內容，及其研究的目的？

答：我最近所作的研究主要是有關香港的傳播媒介與政權過渡的關係。換句話說，在中右報紙如何因應一九九七這個變局。

香港是個活生生的社會實驗室，一葉知秋。它充滿了各種有趣的矛盾，包括中英之間、中央與地方之間、現代與傳統之間的矛盾，提供了很豐富的研究素材。再說，香港是中國現代化的窗口，是中西文化匯合的地方，對傳播研究工作來說，真是個再好不過的地方。此外，我最近也寫了一篇論文，分析美國華文報紙的「美國結」與「中國結」。

問：可否請您談談目前美國學術界對臺灣的觀感？

答：重視臺灣的美國學術界人士，多半是中國問題專家或研究經濟發展方面的專家，至於其他領域的學者，則可能對臺灣沒有太充分的瞭解。要爭取這些意見領袖，必須重學術，在學術言學術才行。（盧秀雲）

（原載：海華雜誌（台）一九八六年二三期 一八一—二〇頁）



從傳統文化看未來的挑戰

李欽湧

一、前言

今天我們要探討的，是一個見仁見智的題目——從傳統文化看未來的挑戰。根本上，我主要的目的，是希望透過「未來學」的觀點，來討論一些關涉到個人，甚至關涉到家庭或社區，在未來所將要面對的問題。而對於這個「未來」，我們亦不必說得太久遠了，就把它範圍在距今二十或三十年後的今天吧；因為我們在座諸君，絕大部分，甚至可說是百分之百，都可以進入二十一世紀。而前一陣子，我們都常提及到哈雷彗星，我們能夠看到它，這確實是個一生難逢的機會。事實上，亦很少人能在其中看過兩次的，因為它約每隔七十五年才會到我們大氣層一次，讓我們得以看見，從這點說來，我們實在是非常榮幸的。另一方面，我們能夠在這個時期，在這轉捩點的時候，橫跨兩個世紀，亦是相當的不容易，同樣亦是值得我們感到榮幸的一點。但是，「台北人」似乎患了健

忘症，不看過去，也不看未來，却只顧眼前；這個看法到底對不對，則見仁見智，這亦是今天我們的主要論點所在。當然，更為重要的，是希望藉助今天這個機會，配合著中國的歷史文化脈絡以及社會環境等特徵，展示出中國獨特而重要的問題，以作為我們系統性的腦力激盪。

當然，對於這個「未來」，如果不仔細去想一想的話，它卻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。而二十一世紀的腳步，馬上便要到來了，那麼，我們到底應該怎樣去準備、去回應呢？在過去這幾年裏，大家對於中國文化，亦會作過不少批判性的工作，而中國社會亦因而難免會有些改變的，這使我聯想到《三國演義》裏頭，所提及的「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」的那番道理，我想，站在現在的眼光來看，這一句話更是適合於描繪現代社會變遷的趨勢。比方說，目前不同

邦國間的爭爭攘攘，正切合《三國演義》裏面這個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」的哲理。

二、文化價值系統與未來的構想：

我們知道，對於未來的構想，在過去的中國，並不是很夠系統性的研究。反之，西方則不同；從整個文化的規範來說，西方人是比較喜歡從事未來變遷的這種理論架構的工作，喜歡去探問將來社會環境變遷的趨勢。深入點說，從柏拉圖·摩爾（Thomas More）、聖·西蒙（Saint Simon）到傅利葉（La Fourier）、甚至於卡爾·馬克斯（Karl Marx），一般說來，在他們對未來的構想當中，都一直是涵蓋著烏托邦的這個思想成分的；他們這個烏托邦的想法，跟東方哲學比較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們對未來的激進構想，而且對於現狀往往是尋求並採取一個比較激烈的方式去改變，希望從而對未來重新作個大調整。而這就是西方文化中，未來學觀點的哲學基礎。

西方國家往往是透過烏托邦這個意識形態，落實於社會的診斷，社會的改變等形式上面。這樣，從好的、正面的方面去想，它就發展成西方「福利國家」的理念（Welfare State）。而在今天，特別是從六十年代以來，如果我們稍為對它省視一下，我們將會發現，許多社會指數、經濟指數比較高的國家，其 Welfare State 所達致的層次也相應地比較高；而其中社會福利辦得最好的，我們常會提到瑞典這個國家

為例；若將它跟美國福利國家的理念、跟日本的、甚至進而跟我們的龍兄虎弟——新加坡來作比較，我們可以說，瑞典的福利措施，已達到相當高的一個層次。但是，在另一方面，我們若從不好的、負面的方面來看，比方說，馬克斯主義，它亦是希望落實其烏托邦的思想，要對社會作激烈的改變的。然而，今天華行馬克斯主義的共產國家，它們許多社會指標、經濟指標，甚至於政治指標，可以說是跟它當初的構想，大異其趣，而呈現負面的成長。

然而在中國傳統文化裡面，到底有沒有烏托邦的這個思想呢？文化人類學家，許煥光博士，他一生是研究東西文化之間的交介比較的，特別是對中國家庭跟西方家庭的這個比較，他有相當的研究心得。他發現到，其實中國人並沒有甚麼真正的烏托邦思想；而我們每次談到社會福利的最高境界，一定是「大同世界」，所謂禮運大同的運作。而這個理念，我們若稍為深入一點分析，今天的瑞典以及許多已開發的國家的社會狀況，在某些層次上，已趨向于禮運大同的這個境界來了。許煥光博士試圖從中國的文化裡面，解答中國到底有沒有烏托邦的思想，結果，他找來找去，最後發現在我我都熟悉的這篇文章——《桃花源記》，會有些這方面的理念。我們知道，在《桃花源記》裡面，陶淵明這位田園詩人，迷途中，忽然間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跑到這麼樣的一個村落裡面去，好像是個世外桃源，而這些人原來都是為逃避動亂而跑

到這個地區來的；陶淵明回去以後，很想念這個安和樂利的地方，想回去再找，却已經找不到了。從此以後我們中國人一直在找尋，而令人懷念的——桃花源到底在那裏呢？

除此之外，中國人便很少有烏托邦的想法了，所以，從西方看來，中國是個相當現實的社會。我記得以前在國外唸書的時候，每次談論到中國人，洋老師們幾乎都會這樣說：「你們中國人實在現世而實際（very practical），這一條路走不通，你們總是有其它的路可走，可以想辦法去打通。」甚至於常常說中國人，means justified the ends，也就是說，我們常常把手段當成目的，而這也是國外常常用以批評中國人的一個論點。但這個看法，並不是很恰當的，不過，無論怎麼樣說，我們姑且先把它擱置起來，先來談談世界的整個趨勢，進而看看我們該如何去因應，對未來作怎麼樣的準備。我們亦常常想到生命循環這個觀念。事實上，個人有一個生命循環，而家庭也有它的一個生命循環，那麼，我們對自己目前的角色該作如何瞭解呢？西方文明對世界最大的貢獻之一，就是對生命循環研究得相當透徹，透過許多臨床研究的經驗，落實到文化的運作，落實到社會的層面上去。而我們今天亦希望從這個觀點來多談一些。

我們知道，在一九七〇年代，有一本震撼世界的書出版，叫做《未來的震撼》（Future Shock），作者是Alvin Toffler，這本書便是嘗試從未來的

境界裡面，研討世界對人類的影響，以及人如何因應之道，這是對未來探索的一個好例子。在另一方面，我們來檢視一下中國，自一八三九年鴉片戰爭以來，中國便進入一個亙古以來空前的一大變局。但與此同時，我們的鄰邦——日本，却剛開始要進入明治維新的時期，所以，我們雖是兄弟之邦，但很可惜的，中日所遭遇的境界，却不太一樣。我們現在甚至可以設想一下，如果中國能夠像德川家康時期那樣，從一六〇〇年代到一八六〇年代，這二百六十年的時間，可以閉關自守，以作自我反省的機會的話，中國的境界可能便不一樣了。因為在德川家康這個時期，它已開始接受西方的衝激，尤其是產業革命的衝激，在這段時期，日本一方面固然是閉關自守，但它亦同時開闢了兩個港口——神戶及長崎，接受西方外來的文化，但是，中國卻沒有這個修身養性的環境，門一打開，西方的文化就是很激烈地衝進來；而日本呢？它的門雖打開，背後却尚有兩百五十年讓它慢慢去調適，而在中國，却是很激烈的方式進來的，所以說西方挾帶著船堅砲利的優勢，對中國所造成的震撼，跟日本是很不一樣的。所以，我認爲今天中、日兩國的不同，許多這些歷史上、傳統上的極源性經驗，都是必須加以考量的。

再換個角度來看，日本到了德川家康的後期，有一個非常出名的人物——宮本武藏，足以代表日本傳統跟現代的境界裏面一個適應性的傳奇人物。他所身

處的是一个武士沒落的時期，但他在文道、武道方面，都能達到相當高的境界，就是現在，日本人都非常推崇他；換句話說，宮本武藏的一生，等於是反應日本整個現代化的過程。但是，我們中國呢？很可惜的，我們的人物，却沒有日本的宮本武藏這樣的一個尖銳焦點，我們的焦點人物太多了，使得我們的「模塑化過程」難以順利進行，反之，日本就只有那幾個「焦點」(focus)，比較容易有樣看樣，有板看板，使得它整個近代化過程，比較容易進展成功。這樣的分析雖過於簡化，「文武兼備」的日本現代化特性，却是事實。

三、世界觀的變遷趨勢

再說，從整個世界的觀點來看，中國在接受西方的這個衝激後，也促成許多近代化、現代化的論戰，五四運動便是個很好的例子，傅德先生(democracy)、賽先生(science)這兩方面的爭論與衝激，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，意義深長。而西方許多學者，也紛紛加入這個行列，民國三十八年，大陸變色以後，爭論更是達到了一個極點。他們最熱衷於檢討中國這個傳統文化，對於未來、對現代化，到底能夠產生怎樣的助力與阻力？我們知道，一九四〇年代、一九五〇年代，許多西方的學者，特別是以費正清(Fairbank)這個哈佛大學歷史學家為首的許多研究中國近代化的西方學者，都存有一個非常偏差的想法，他們看待中國人與中國文化，都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，

用英文來說，就是「ambivalence」也就是又愛又恨的這種心情。因為西方受到成吉思汗這個震撼的衝激，「黃禍」這個觀念，便一直深植於西方白人的文化裡頭。套句佛洛伊德用語，在西方人的潛意識裏面，存在著「恨」的這個感覺；但是，另一方面，西方人又相當好奇，特別是對我們東方這個神秘的文化古國，又帶有一種鍾愛跟羨慕的意識觀點。基於這個觀點，我們可以說，美國的一部對華外交史，完全就是一種愛與恨的交集，像我們剛撤退到台灣時，美國馬上便發表白皮書，這便是很好的一個例子；而越南的悲慘結局，亦算是一例子。

現在，讓我們再回到以費正清為首的這些所謂西方中國通，他們鑒於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的緣故，大都認為儒家文化有礙於現代化、有礙於近代化，終而造成中國大陸的變色。這種看法是偏頗的，我們可以這樣說，這實乃基於西方在五〇年代、六〇年代的老大優越心態，才會產生對其它民族文化的這個悲觀看法。因為，西方在文化、經濟、社會等方面，都發展到極致了，而反觀許多發展中國家，特別是中國，却是一籌莫展，這裡面一定有原因的。因此，在學術合理化的過程中，他們遂進而認為中國的儒家文化，實在對於現代化過程，起着很大的阻力；更進一步認為中國大陸的變色，乃根源於儒家文化。但是，到了一九七〇年代，美國人由於越戰的教訓，對於西方這套文化，卻開始從以往的樂觀漸漸變成悲觀的想法。從一

更廣遠的角度去看，我們知道，有名的思想庫——「羅馬俱樂部」，或「羅馬學會」(Club of Rome)，乃是西方樂觀思想、西方尋求烏托邦思想的一個焦點；因為他們覺得有這份社會道義，對世界的現狀及未來作診斷。為甚麼要選上羅馬作為集會的地點呢？這實在是有其象徵上的意義的，因為西方文化是從羅馬開始的，他們想使羅馬式西方文化回復到以前的世界中心。撇開這點不談，當時的羅馬學會，實足以反映出西方在五〇年代、六〇年代的自我中心優越思想；它覺得世界是無窮盡的，可以一直向上征服，所以，它當時就覺得只管一直往前衝，一九六九年阿姆斯壯(Armstrong)的「我的一小步，人類的一大步」，登陸月球算是成長極致的代表了。

但是，進入七〇年代以後，以美國為主的世界經濟，受到很大的打擊；最基本的因素，除了在五〇年代、六〇年代，由於基於二次世界大戰後重建計劃，而帶動的工業成長以外，它負面的方面，就是美國之參予越戰，每天花上好幾百萬美元；而在國內呢？當時詹森總統有一個大社會的計劃——反貧窮計劃。這是一個很大規模的社會福利計劃，亦可說是西方貫徹烏托邦思想的縮影。希望透過聯邦政府大量社會投資，將「貧窮」自美國本土上面消除掉。然而美國內外過度投資花費的結果，使得美國在七十年代以後，出現相當高的通貨膨脹(inflation)；因為鈔票印得太多了，而當市面上有太多鈔票跑來跑去的時候，

通貨膨脹便很容易產生。

所以，一九七〇年代，西方進入一個比較悲觀的時期。有些人更進一步把七〇年代稱之為「唯我至上的時代」(Me Generation)，一切「人人為我，我不為人人」；當時許多的年青人，就是這樣的一切以滿足自己慾望需求為主。加上一九七四年、一九七九年，接二連三的發生能源危機，於是，「羅馬學會」便開始想到，這個世界到底還是有限制的，於是這本書——《成長的極限》(The Limits of Growth)

，正可代表著西方對七〇年代的一個迴響。所以，怪不得在一九七〇年代，MIT兩位教授Donella Meadows and Dennis Meadows，他們利用電腦資訊的技術，將五個主要的變數——人口的成長、工業化過程、污染的程度、糧食生產的變數、加上資源消耗等，利用電腦作模擬運作。想藉此找出這五項變數跟世界成長的資源之間的交互關係；結果，他們發現到污染跟能源的消耗，幾乎是成幾何式的增加；而工業化過程跟糧食生產，則作算術式的成長；如果是這樣子的話，世界的資源馬上就會消耗掉了，這倒有點像馬爾薩斯的人口論：糧食的成長，是算術式的，人口的成長，是幾何式的，如果人口不加以控制的話，那麼，世界的資源可能很快地便消耗殆盡了。這都是相當悲觀的看法。

不過，到了一九八〇年代以後，西方卻發現七〇年代這個悲觀的想法，並沒有獲得實質性的印證；我

們姑且稱這個八〇年代為「謹慎而樂觀」的時代。而在這個時期，約翰·奈斯比出了一本書，叫做《大趨勢》(The Great Change)，這本書告訴我們，這個世界還是相當有希望的，站在這基礎上，我們怎麼樣去發掘未來呢？這是個很基本的問題。社會學家佛立門(David Freeman)會將地球五億年的歷史，縮小成八十天；那麼，地球開始有生物出現，只不過是六十天以前的事，而在一個小時以前，這個地球上，才有你我的祖先——人類，開始僕僕前進，到了六分鐘以前，人類才開始想到用石頭、用石器，開始使用它來幫助我們過比較好的生活，而在一分鐘以前，我們才有記錄的歷史，在十秒鐘以前，金屬才開始被人類使用，而真正跟現代社會息息相關的產業革命、工業革命，也不過是十分之三秒以前出現。所以，世界的人類歷史的確是很年青；未來的境界還是相當遙遠而且富有潛能而值得開發的。

四、危機與契機：

不過，在這麼千變萬化的社會裡面，仍是會存在著許多有形與無形危機的。當然，其中最大的危機之一，就是存在於西方高度生活品質享受裡面的一「恐核危機」的這種心理。直到今天，如果以嚴謹的比較觀點來看，我們的世界家庭目前還是問題多於答案。比方說，我們來看看非洲這個黑色大陸，它今天的生活狀況，除了少數的國家，像肯亞、象牙海岸、南非的白人等幾個地區的生活狀況有進步以外，非洲大部分

地區的生活指標、經濟指標，比起一九六〇年代還要來得差。拿我們的鄰邦——菲律賓為例，菲律賓在馬可仕上台的時候，其人民的平均年收入，恐怕還要比台灣來得稍高一點。我記得唸高中的時候，那時菲律賓的僑生都非常自傲，認為自己是從已開發的世界到我們這個未開發的國度來；但現在不一樣了，我們目前還僱用菲律賓來的傭人呢。所以，八十年代裡很多開發中的國家，反而是節節後退，大不如前。再說到一九八四年，那是國際兒童年，在那一年裡面，世界上卻有五百萬以上的兒童從地球上消失掉，但那並不是由於戰爭的緣故，而是由於飢餓的緣故。我們實在不敢想像餓死(sarvation)到底是甚麼樣子的，甚至在美國，今天亦是有一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」的情形存在著呢？

現在，我們再來談另一個世界性的危機——人口，當然，就整個世界的趨勢來說，人口在目前已經幾乎不成為一個重大危機；在生育率平均降到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二十的情況下，算是稍為緩和下來了，但人口的問題還是緊跟著人類社區。

以印度為例，據推測，再過十五年左右，將會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，它現在還是最貧窮的國家之一，而且目前已有七億人口了；而世界上的節育計劃，卻是從印度開始的，今天，印度仍然是高生育率地區之一。這正是傳統文化與現代科技交集衝突的一個明顯例子。事實告訴我們，如果傳統規範無法落實

於現代社會的適應上面，則傳統文化便可能成爲現代化過程中很大的阻力。當然，許多開發中國家的遠景，並不全都是如此悲觀與無力感；像亞洲四小龍中的韓國、中華民國、香港和新加坡，他們不但遠程樂觀，就是近程的成就已經相當的高而令人鼓舞的。

五、未來的理念與挑戰：

我們在邁向未來的過程中，與世界各民族、各文化一樣，將面對著種種共同的危機，也具有潛能性的契機。我們與世界各民族雖不屬於同一個過去，却將分享同一個未來，這就不得不考慮一些根源性的問題：我們將生活在什麼樣的未來社會？面臨的，將是什麼樣的未來？我們該扮演什麼「世界性」的角色，我們能扮演什麼角色？中國人如何期望在未來世界文化的創生過程中提出自己獨特的貢獻？我們看未來，並不是過去的延續，否則生活的目的將是多餘的。我們需要了解未來可能發生什麼？我們需要以五年以內的

「漸進性未來」，五年到十五年間的「中程性未來」，甚至於十五年到三十年間的「遠程性未來」爲時間架構，去不斷地探索、嘗試，認清楚「太陽永遠從東方升起」的某些必然未來的現象與行爲；去研究屬於「可能」的未來，何況在方興未艾的科技發展中，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。中國人的桃花源式「大同」夢想，未必永遠沒有實現的一天；但是，在這一天到來之前，我們更需重新驗證自己已有的精神資源，更新自己的社會規範與價值系統，儘量避免「意外性的未來」，在反省與檢討中，爲我們下一階段的發展，提供一個新的始點。

謹識：作者現任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長暨系主任。
本文乃根據「中國文化研討會」專題演講詞整理而成，初稿整理工作由東海哲學研究所關亮清同學擔任，特此致謝。



（原載：中國文化月刊〔台〕九八七年九〇期二三—三二頁）

中西文化的分野

周瑞玉

一、文化的真義

每一個國家都有其傳統文化，傳統文化可稱為固有的歷史文化。文化既離不開歷史，亦就是無歷史即無文化。文化乃代表人類智慧的結晶，所以每一個國家或每一個民族，都珍惜他們自己的文化，同時也仰慕其他國家民族的文化，各國博物館，無不極力蒐集世界國家民族藝術品，予以保護，也就是他們珍惜文化的表現。

社會越文明，對文化價值也越高，人們往往以文化高低去衡量一個國家的價值，有些國家惟恐追趕不及，而拼命創造新文化，予以珍藏展示，如美國將他們的人權宣言與獨立憲法原稿，視為國寶，妥為陳列，供人觀賞，至於卡特總統何以極力堅持尊重傳統人權政策，以重建美國日漸沒落的聲威，即為一例。

文化不但代表一個國家的價值，而且還是立國的要素。以色列雖然亡國兩千多年，但因他有光輝燦爛的猶太文化，故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復國。反觀非洲擁有數十個國家，具有傳統獨立文化者，實寥寥若晨星，這些國家存在的價值高低，自可想見，可見文化與國家民族有極深厚的依存關係。

二、中國文化的特點

中國文化乃建立在人與人的協調關係，源遠流長，浩如淵海，但如盤根究節，追本溯源，則與儒道釋三大主要思想有關。

儒家思想，蘊育於「仁愛」二字。仁者不能獨善其身，必須兼善天下，要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。論兼善則必須論泛愛，孔子說：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泛愛眾而親仁。」就是要我們愛眾親仁，簡而言之，就是要我們自己為人。儒家為「仁愛」一切均可拋棄，甚至連自己的性命也要犧牲，所以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」便為追求仁愛的鐵律。但如何追求「

仁愛」呢？大學裏說：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為本。」「修身」便是儒家治事方法的起點，要修身，便須探知人與人間的關係。可是人與人間的關係是很複雜的，因此要將複雜關係為君臣（國家與人民）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五種，即為天下五達道，又名五倫。就是孟子所教之「父子有綱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」再以知仁勇以加強這五種人與人間的關係，乃謂三達德。以仁為中心，仁者之知必為智，仁者之行必為勇，道德的中心意義，就是個「仁」字。仁相人偶也，乃人與人相處之關係。人性本善，故人與人間的相處是合乎智與勇的，亦即合乎道德，合乎仁，造成仁的社會。

人與人間的關係，最密切接近者，莫過於家庭，所以仁的行為，首先在家庭中表現出來，再推於社會國家，以至於天下。所謂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。」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」「一家仁，一國興仁，一家讓，一國興讓。」可見儒家言愛，乃由親而疏，由小而大，由近而遠，適合人性而富有人情味。簡括言之，儒家思想，側重倫理道德，目的在建立人與人的協調關係。

道家的思想，其最終目的，在尋求道，所謂道，就是真理，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。」何謂道？即以自然的本體，應用於人世。老子說：「有物混然，先天地生。」便是指自然本體恬然無事，氣化推遷，也就是道家的精神。所謂以天地為虛虛，日月為蠶蠟，最能代表一種玄妙深藏心念自然的哲學，教人如何生活得無憂無慮。簡括言之，道家思想，重超脫現世，崇尚個人自由，目的在建立人與自然的協調關係。

佛家思想，主張清心寡慾，見性成佛。以心的覺悟來觀照宇宙與人生的究竟，代表一種心遊

物外，自我犧牲的哲學。所謂「法不孤起，待緣而有。」是佛家對宇宙萬有現象生起的說明。無數宗教，多講如何死後靈魂得救，而佛教則講求現世個人的體悟。三藏十二部經，都是教人如何體悟成佛。佛以慈悲平等為主教的本體，清心超脫，則為體悟成佛必經之路。故佛以空明清淨為施教的方法。簡而言之，佛家思想則重於出世精神，教人如何入世宛如出世，目的在建立人與精神的協調關係。

儒家與道家思想，產生於中國本土，統治着東方的學術思想，垂二千五百年之久。佛家思想自東漢以後，傳入中國，亦有二千年的歷史，其後又由我國傳入日本。溯佛教傳入中國後，即與儒道二家思想相結合。儒佛兩家的交流，起於唐朝而盛於宋朝。儒道佛三家思想，匯合為中國文化的主流。孔子之學，為修其仁義，教以人倫。老子之學，為任其自然，教以無為。釋迦之學，為悟其心性，教以明淨。從理論上而言，三教思想，涇渭分明，但從實際看來，實絕對對分清楚。所以中國人往往接受三家思想，而不互相排斥，這也是形成中國人不歧視外來文化的特性，與免除宗教戰爭的原因，因有王道文化之稱。

三、西方文化的成因

西方文化有兩骨幹，一為希臘的哲學，一為希伯來的宗教。希臘的哲學，源於紀元前六世紀，約與我國孔子同時。希臘為地中海半島的國家，山海交錯，地狹人稀，逼使希臘人向小亞西亞、義大利、西西里開拓殖民地，故把中東的宗教，埃及的幾何學，巴比倫的天文學，與斐尼基人所創的字母，融合為一完整的西洋哲學。基督教從近東輸入歐洲，自西元二七二年至三三七年間，羅馬君子坦丁大帝奉教以後，即掌握着歐洲中古時代的政治、宗教及文化一部份，中古哲學便由基督教士手寫而成，也可以說，基督教將猶太

的宗教、希臘的哲學與羅馬政治揉合成為西方文化的基石。

生於紀元前四六九年的希臘大哲蘇格拉底，乃一純粹理智愛好者，他認為罪惡便是起於無知，有知方為有德。智慧是真正的貨幣，萬物都應以此為衡標準，故蘇格拉底是主張智德兼修的。生於紀元前三八四年的希臘另一個聖哲亞里士多德說：「人生最大的快樂，在於深思熟慮，故哲學家最為快樂。生於紀元前四二七年的柏拉圖以神為幾何學家，他說：「人類所感覺者，始終不如想像的完善。故思想的地位，超越感覺之上」。希臘人主張能者在位的民治政府，但何為能者？柏拉圖認為哲學家就是能者，故政治家必以哲學家充之。希臘此種重知識與重思維的哲學，實為近代西方科學民主的根源。如說西方文化便是基督教文化，並不為過。基督教乃由猶太教演變而來，猶太民族在耶穌誕生以前，數千年來信奉一神，認為猶太民族乃上帝特別眷顧的民族。到了耶穌誕生，他便將此一神主義，擴展至全人類。說是上帝是全人類的主宰，不祇愛猶太人，而愛全世界的人民，所有的人，都應當尊他為唯一的神。基督教的傳入歐土，曾經艱辛的歷程，羅馬人是相信多神的，對於上帝為獨一無二主宰的說法，是不能接受。先是極力排拒基督教，後竟大肆迫害基督教徒達二百餘年。希臘本也是信奉多神的，但希臘人相信神的奇蹟，與耶穌所宣示的神蹟吻合，故很容易接受基督教，雖然羅馬人迫害基督徒，但基督徒與日俱增，遂於四世紀即停止迫害。到了五世紀，羅馬諸皇也成為基督教徒了。此後經數百年長期在經院裏，和中古世紀大學裏，基督教與希臘哲學互相調和，基督教遂與希臘羅馬文化結了不解緣，而成為西方文化的基石，也是西方倫理道德的源泉。

四、中西文化的異同

茲從宗教、政治、社會、哲學等方面以觀察中西文化的異同，分析如左：

以宗教而言，中國文化有三大思想，儒家不談生死，道家則空言長生，佛家以生死為人生不可避免之自然法則。西方之基督教則重「永生」，以人的肉身是會死的，死後重生則為靈身是不會死的，故重生的生命，始為永久之生命，其與一也。儒家盡人孝以待天命的原由，是一種尊天的觀念，所謂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」，「一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」，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，知我者其天乎」，即為明證。西方基督教教義，認為人類受造於天，萬物也受造於天，故奉天主為萬物的主宰，因而西方以聽天命來盡人事的思想，與中國以盡人事以待天命的觀念，其異二也。中國宗教講生死輪迴，因果報應，今生為善，來世必有善報，今生為惡，來世必有惡報。所謂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所以中國人對宗教，都認為行善避惡的，故不排斥他教，西方基督教義也有此種因果報應觀念，為唯一與中國文化相同之處。

中國人在政治上，認為管理政事，乃知識分子的責任，故儒家政治哲學，由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。儒家以孔子人格教育為中心觀念，必須具有智仁勇三達德的君子，方能成為政治家。為求聖賢之治，必先修身齊家為人表率，故政者正也，西方則認為政府應由全國國民所共管，無論男女老幼士農工商均有參政之權，因而中西文化在政治傳統上不同之處，為西方為求民主之治，而中國從古即企求賢君之治。

中國人認為社會為個人集合體，有羣體的存，方有個體的活動。孔子教人以忠恕之道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先大我而後小我的生活。西方則深信天賦人權，人人生而平等之說，特別重個人的價值與權利，認為個人價值，可以改變羣體的價值。人們為了追求個人的成功，經常與他人處於競爭的地位。這兩文優勝劣敗天演公例，便是源於此種思想。這樣奪我的結果，使社會羣體論為不受重視的地位。西方人這種奪我的觀念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喪禮無遺。中國人進講，皆重

合食而讓讓，西方人則分食而各取所需的自我主義。中國人以自謙為美德，切戒炫耀自己的聰明才智，大智若愚。而西方人則自尊自大，尤於競選公職或民意代表時，必妄自尊強，誇大自我宣傳。西方人有所發明，則主張專利，恐人分享其權利。在家庭生活上，中西文化亦有顯著的不同，中國人偏重統統的父子之親，西方人則偏重橫的夫婦之愛。中國人重視家人永世和諧相親，西方人重視各個成員的獨立自主。這兩種家庭生活，各有利弊。個重父子之親，可以泯除「代溝」的悲劇，五代同堂之老少常能和睦相親，互相關懷，只覺有安全感，而無疏離感。其缺點乃個人缺乏自立觀念，養成依賴心理，而且父母犧牲太大，易將全副精神，放在家庭上多，而放在國家民族上少。偏重夫婦之愛，其優點乃父母責任較輕，可享畫眉之樂，子女自幼可養成獨立精神，成為民主制度之基礎。其缺點為較少人情味，因為人不能孤獨生活，須在情懷愛網之中生活，才能享受幸福快樂，而父母子女兄弟姊妹之間，永世互相關切，無條件互相援助，同甘共苦的生活，才是自然的情懷愛網，此皆中西文化在社會觀念上顯著不同也。

關於哲學方面，中國人對於人的行為，應有節制，以中庸為理想範疇，勿使過猶不及。此種中庸觀念，成為中國統治性的哲學觀念，也就是自我與外物兼容並蓄。故中國文化的精華，在對內求統一，對外主和平。所以對外來文化及宗教，從不排斥與歧視，祇尚其同，不究其異，祇取其長，而去其短。早期西方哲學思想，亦有趨向中庸之論，不幸於法國的盧梭，德國的叔本華與尼采所創的浪漫派哲學，尊敬意志，崇拜權力，觸發世界大戰的納粹與法西斯由是而誕生。此種對內集權，對外侵略的思想，便與中國文化大異其趣。

五、結論

中西文化雖各有不同，但甚可將其去蕪存菁，截長補短，使倫理之情，自立意識，融為一體。我們 孫總理主張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，乃繼承中國傳統優良文化，更吸收西方文化之優點，創立三民主義，以冀各民族間相互了解，彼此團結，不相爭奪，和平共處，而使中西文化殊途同歸，則天下一家世界大同，確信不難實現也。

(原載：青年日報「台」一九八七年 四月二〇日第一〇版)

秦文化初探

涂艷秋

前言

秦自嬴政廿六年（西元前二二一年）併四海，有天下，至于嬰出降劉邦（西元前二〇六年）止，共歷年所十五，十五年就一個國家而言，其生命尚屬短暫，況從歷史洪流上著眼，而欲究其文化創造，幾屬微渺。然而因此斷言秦無文化也是失之武斷。吾人若從遠古時代至其滅亡，縱觀秦的歷史足跡，或可稍有所獲。而秦的歷史遲至文公十三年才「初有史記事」（史記秦本紀），也就是至此秦的歷史才有正確年代可繫屬，此時已經進入東周，平王東遷也已數年了。本文的目的即在初步探討這五百多年中秦的文化。

壹、秦民族的形成

關於秦民族的形成歷來的說法不一，大約可分為下列四種：

- (1) 秦原系歐羅巴人種，來自中亞或歐洲。

民國初年這種主張受到相當多人的贊成，但不可否認的，歐羅巴人種進入中國的西北和西部時間很晚，大約在西元前一千年左右，而秦却是較早融入華夏民族的一支，在人種上與歐羅巴無關。

- (2) 秦原系西方戎族

蒙文通先生根據史記秦本紀申侯所言：「昔我先鄠山之女，

爲戎胥軒妻。」及漢書律曆志所載「鄠山女亦爲天子」，而推測秦之祖先爲西戎。並輔以古籍中稱秦爲戎或戎狄，肯定秦爲西戎無疑。（見周秦少數民族研究）但據史記秦本紀申侯此段話並未曾指出鄠山女爲天子，其主旨只在強調他們和戎狄的關係，以達到「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駘適者」的目的，不可據以爲民族來源之證。同書中太史公亦嘗記下「生中澆，以親故歸，保西垂，西垂以故和睦。」乍看下彷彿秦是爲周保其西垂，在周任官，而謹其職守，其實同一本紀中太史公也記著「自太戊以下，中衍之後，遂世有功，以佐殷國，故嬴姓多顯，遂爲諸侯，其玄孫曰中澆，在西戎保西垂。」秦當是任官於殷，爲殷守其西垂之地。而非爲周之邊官。申侯此段話破綻叢生實不足爲據。至於公羊傳稱「秦者，夷也」，穀梁傳又說：「狄秦也」，這也只是鄙薄其俗在長久與戎狄接觸之下，地域相近的情形下，竟使風俗習慣類同於戎狄，況春秋大義本是以文化的趨向來分別夷夏的，又何足以證明秦之人種同於西戎？另秦本紀中載周天子對秦襄公會言「戎無道，侵奪我岐豐之地」一語中可知周本以秦別於戎。

- (3) 秦與周爲同一氏族

呂振羽的「中國原始社會史」中提出了一個假設，認爲「商族自東來，夏族自西來，後來夏族向東南者便發展爲後來的周族，留在關中一帶的便形成後來的秦國。」姑不論這個假設的正確如何？我們來討論周與秦間的關係又是如何？

由祖先的傳說上來看；秦的始祖女脩是「玄鳥隕卵，女脩吞之，生子大業。」而周之始祖姜原則是「見巨人迹，踐身而動」

，二者毫無相關性。又秦的祖先伯翳「佐舜調馴鳥獸，鳥獸多馴服」，但周的祖先后稷是「好種樹麻菽、麻菽美，乃為成人，遂好耕農，相地之宜，宜谷者稼穡焉。」遠古的傳說雖然不是史實，但是每個民族的傳說，必定與他們的生活習慣有關，同時也是他們心中認同標準的神話化。所以從遠古傳說的類似或相異中，可以了解兩個氏族間的關係。從這個角度看秦與周之關係並不密切，恐怕也非來自一源。

但是從尙書牧誓中我們却可以發現，周武王滅商時曾聯合西方與南方的氏族共同「翦商」，其中包括庸、蜀、羌、豳、微、戶、彭、濮等，可是沒有秦，也不包含嬴姓的徐、奄等。而據史記秦本紀云：「惡來有力，蜚廉善走，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。」荀子的成相篇也載「事之災、妒賢能、飛廉知政任惡來」其中飛廉即史記中的蜚廉。可見秦的先人本是殷之臣民，自中衍任官於殷就頗受殷朝的重視而有「嬴姓多顯」的盛況，到了殷紂時蜚廉惡來父子更為效忠於紂而死，不得不令人覺得秦與殷淵源之密切。

(4) 秦與殷為同一氏族

史記殷本紀「殷契，母曰簡狄，有娥氏之女，為帝馨次妃，三人行浴，見玄鳥墮其卵，簡狄取吞之，因孕生契，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，帝舜乃命契曰：『百姓不親，五品不訓，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，五教在寬。』封於商，賜姓子氏。」

秦本紀「秦之先，帝顓頊之苗裔，孫曰女脩，女脩織，玄鳥隕卵，女脩吞之，生子大業，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，女華生大費，與禹平水土，已成，帝賜玄圭，禹受曰：『非予能成，亦大費為輔。』帝舜曰：『咨，爾費，贊禹功，其賜爾阜游，爾後嗣將大出。』乃妻之姚姓之玉女，大費拜受，佐舜調馴鳥獸，鳥獸多馴服，是為伯翳，舜賜姓嬴氏。」

由殷本紀與秦本紀的比較可得知(1)殷之先人與秦人之先人都有吞食玄鳥之卵而生其祖的傳說，可見玄鳥為殷與秦共同崇拜的對象，甚至可推論玄鳥可能就是此二氏族遠古所崇拜的圖騰。(2)殷之姓子與秦之姓嬴都是舜所賜。(3)契與大業都曾佐禹而平治洪水，可見二氏族均長於水利。

據尙書盤庚云：「盤庚五遷，將治亳殷。」可知盤庚之前，乃至盤庚之時，殷人屢次遷徙。雖然王國維認為是「由亳居藩一遷，藩遷砥石二遷，砥石遷商三遷……商遷泰山之下，復又遷商，四遷五遷；商遷殷六遷，殷又遷商七遷，商遷亳八遷。」(觀堂集林卷十二)姑不論遷徙的次數是五或是八，總之此現象至少顯示出商的祖先遷徙不斷的事實，很可能殷是個狩獵遊牧的民族。而秦人之初也以狩獵為主，如伯翳為舜「調馴鳥獸，鳥獸多馴服。」而費昌、仲衍則善御，非子「好馬及畜，善養息之。」都顯露出保有狩獵遊牧的習俗，另外連最近考古的發現，秦墓與殷墓不但形式相近，且連墓壁、殉葬等方式都相同。這可證明秦與殷關係之密切(註一)，殷是東方的氏族(註二)，秦也當屬於我國東海之濱的一支。以上之說多取林劍鳴先生之論。

嬴之為姓乃是因佐禹治水。受舜所賜而來，但秦字的由來則是因周孝王召非子至汧渭之間，為周室養馬，結果「馬大藩息」，孝王於是「朕其分土為附庸，邑之秦，使復續嬴氏祀，號曰秦嬴。」遲至周孝王時封秦為附庸；方准許他們在秦州(註三)築邑而居，秦才成為嬴姓的正式名稱。

然而秦人為何由東至西長途遠涉？據史記秦本紀所載：「自太戊以下，中衍之後，遂世有功，以佐殷國，故嬴姓多顯，遂為諸侯，其玄孫曰中湫，在西戎保西垂。」由此可知商朝時秦人屢建其功，而名顯當時，到中湫時則被派往西方，為殷守西方邊境。從此一部份嬴姓之人就居於渭水中游。此為當時殷之西境，這